

中國之
武士道

梁启超

中国之武士道

梁启超
刘泗
译 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之武士道 / 梁启超著.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6.6

ISBN 7-80166-677-1

I. 中... II. 梁... III. 武士—研究—中国—春秋时代~西
汉时代 IV. 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9891 号

ZHONGGUO ZHI WUSHIDAO

出版: 中国档案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1 号)

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格: 787×1092 1/16 印张/13.5 字数/10 万字

版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前言

何意百炼钢 化为绕指柔

武士道精神不是起源于日本吗？不是日本人独有的吗？怎么中国也有武士道吗？

《中国之武士道》一书有如当头棒喝，它告诉你，告诉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炎黄子孙：你的观念是错误的，中华民族的尚武传统渊远流长，中国有自己的武士道传统和武士道精神。只是年代久远，世事变迁，人心不古，那种惊天地、泣鬼神、慷慨悲歌的豪侠气概和勇武人格已经湮灭了，被我们淡忘了。

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写于1904年（即清光绪三十年）10月。11月，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署名“饮冰室主人”。

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梁启超32岁，因为戊戌变法失败遭到清政府的通缉，流亡在日本。

国家的衰朽，政治的腐败，国民精神的懦弱，造成了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当时西方和日本都认为“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这刺激着梁启超年轻而敏感的心灵，他激动地说：“吾耻其言，吾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于是愤而下笔，著成此书。

梁启超选取了七十多个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人物作为中国武士道精神的体现者，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身份、地位迥异，有侠客、有刺客，既有君主、将军、宰相、太子这样的显贵高

官,也有地方官员、陪臣、谋士、士兵,还有仆人、渔夫、民妇、屠夫等社会下层的普通人。

作为个人,他们重朋友、重道义、重名誉、重然诺,轻生死、淡功名、有血性、有个性,除暴安良、扶危济困、急人所难,行侠仗义,往往为了一句诺言而捐弃生命,为了名誉而抛头撒血。士可杀而不可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作为公民,作为国家的官员,他们爱自己的国家,忠于职责,坚守岗位,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大义高于生命,当使命不能完成,国家遇到危难的时候,宁肯牺牲自己以维护生命的准则和使命的崇高,挽救国家的命运。

令人吃惊的是,梁启超把孔子作为中国武士道的第一人。他以孔子在外交场合不惧强齐,勇敢坚定地维护并争取鲁国的国家利益为证,认为天下的大勇,没有超过孔子的,指出孔子一贯提倡尚武精神。这颠覆了一直以来人们对儒家,对孔子中庸、懦弱、无能的印象,让人们看到了孔子令人尊敬、值得崇尚的另一面。

事实上,由于复杂的政治、社会等原因,中国传统的尚武精神光大于春秋、战国时期,就是梁启超所谓“霸国政治”时代,而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专制政治体系之后,中国的武士道精神和传承其精神的人物就渐渐消失了。

梁启超在该书的长篇序言里带着悲愤的感情回顾了武士道精神归于瓦解湮灭的历程和原因,并指出这一精神的消失对中国民族性的戕害是中国近代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他一再发出令人悲伤的感叹: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梁启超的这个长序文笔优美、感情充沛,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回忆他青年时代的时候说:梁任公先生的言论披靡了一世,《中国之武士道》的长序一

类文字是我的最爱好的读物。^①

值得指出的是，历史学家雷海宗称秦汉以后的中国文化为“无兵的文化”，就是指中国文化中“尚武”精神和“武德”的消失。他还进一步指出，只有文武兼备的人才有坦白光明的人格，文武兼备的社会才是坦白光明的社会。偏重文德使人文弱、柔佞、阴险，只知使用心计、欺诈，失去了光明磊落的风度，中国二千年来社会各方面的卑鄙黑暗都是文德畸形发展的产物。^②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深受梁启超的影响，梁主编的《新民丛报》是他最喜欢的读物，毛泽东很赞同梁启超振兴中华武德的主张，他在写于1917年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阐述了与《中国之武士道》一样的思想，他在文章的开头即指出：“国力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并提出“欲文明其精神，先野蛮其体魄”的主张。^③

总之，所谓武士道，不是某种身份如武士、侠客、刺客，也不是某些行为如生猛、卤莽、讲义气、敢拼命，而是一种精神，一种刚健昂扬、积极果敢、有原则、有坚持、不苟且、不委琐的生活态度。这样的精神和态度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崛起和振兴所必需的。

梁启超历来主张要革新国家，就要先革新国民的精神和思想。他写作此书也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以先民的武德作为子孙后代的模范。所以，此书在当时曾作为高等小学和中学的教科书使用。

梁启超还认为，当时新知识的输入已经使中国文化的精神有丧失的危险，而书中的先秦名文能够启发学生的文学天才。的确，梁所选取的文章均为古文中的精华，不但言简意深，叙述精当，而且生动传神，感情丰沛。梁启超以“新史氏”的名义在每篇

① 《顾颉刚自述》1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版。

②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55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65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

之后所作的评论,更是字字激扬,句句慷慨,如刀如剑,使古人的武士道精神跃然纸上。那种期盼中华民族振兴的殷殷之情,对中华民族已经消失不彰的武士精神的追怀赞叹,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悲愤令人扼腕感叹,痛彻心肺。

本书根据上海广智书局 1904 年初版排印,并参照了台湾中华书局 1974 年版做了订正。

本书的古文部分主要出自《史记》、《左传》、《战国策》、《国语》等典籍,没有注释和今译,很多篇章难以理解,笔者勉为其难,译成现代文,供读者参考。^①

刘 涓

2006 年 2 月 26 日



① 译文主要参考书目:吴则虞编著《晏子春秋集释》(中华书局,1962 年版),王伯祥选注《史记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年版),浩樵选注《鲁仲连列传》(群众出版社,1962 年版),沈玉成译《左传译文》(中华书局,1981 年版),许维通校释《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1980 年版),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

杨度叙^①

新会梁氏撰《中国之武士道》一书既成，且自为之叙。以示杨度，杨度曰：子之命是书为《中国之武士道》也，岂非欲别于日本之武士道乎？其欲别于日本之武士道也，岂非以武士道之名，虽日本所有而中国所无？然以云武士，则惟日本以为藩士之专称；以云武士道，则实不仅为武士独守之道，凡日本之人，盖无不宗斯道

者。此其道与西洋各国所谓人道 Humanity 者，本无以异。西人以此问题竞争战斗而死者史不可胜述，惟其名不如武士道之名有轻死尚侠之意焉。

① 杨度（1875—1931）湖南湘潭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活动家，字皙子，别号虎禅。



《中国之武士道》初版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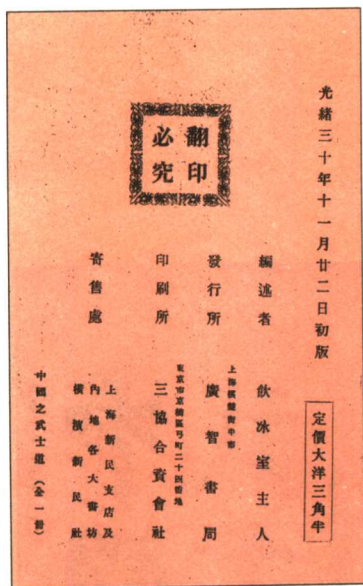
中国古昔虽无此名而有其实，则假彼通用之名词，以表扬吾民族固有之天性，固无可也。虽然，合二国之历史比较而观之，此中有一大问题焉。乃日本之武士道，垂千百年，而愈久愈烈，至今不衰，其结果所成者，于内则致维新革命之功，于外则拒蒙古，胜中国，并朝鲜，仆强俄，赫然为世界一等国。

若吾中国之所谓武士道，则自汉以后，即已气风歇灭，愈积愈懦。其结果所成者，于内则数千年来，霸者迭出，此起彼仆，人民之权利，任其铲削，任其压制，而无丝毫抵抗之力；于外则五胡入而扰之，辽金入而扰之，蒙古满洲入而主我，一遇外敌，交锋即败。至今欧美各国，合而图我，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国民昧昧冥冥，知之者不敢呻吟，不知者莫知痛苦，柔弱脆懦，至于此极，比之日本，适为反对。一则古微而今盛，一则古有而今无，现象之相反如此，此其故何哉？梁氏之论中国也，曰专制政体之故。

杨度曰：岂独政治，盖亦学术之异有以使之然者矣。

夫日本本无固有之学术，自与中国交通以后，乃以中国之学为学，直接而传中国之儒教，间接而传印度之佛教，举国中人，无能出此二教之范围者。夫此二教者，其义相反，而其用有相足者，何以言之？

孔子之道，专主现世主义，谆谆于子臣弟友之节，仁义礼智之道，经传所载，惟于身心性命家国天下之关系，反复言之。而于有生以前，既生以后，皆不过问。故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吾欲言死有知乎？恐孝子顺孙，妨生以事死；吾欲言死无知乎？恐不孝之子，弃其父母而不葬，故惟言朝闻道可以夕死，无求生以害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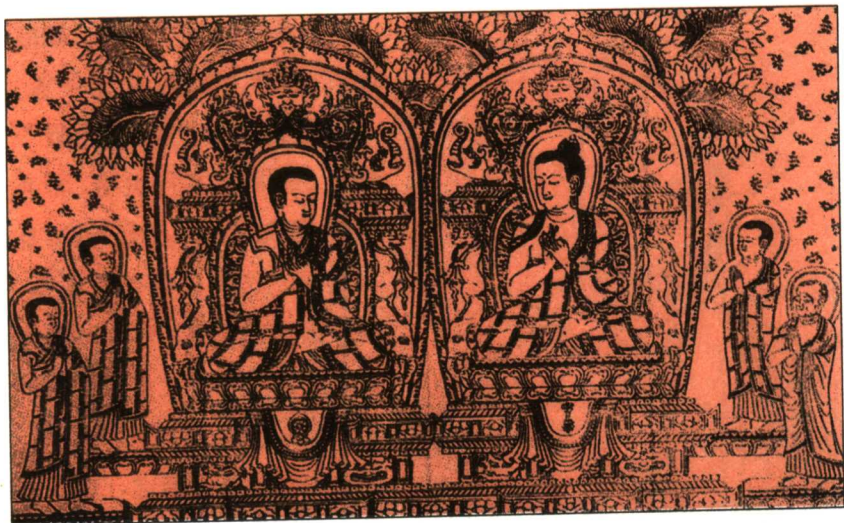


《中国之武士道》初版版权页。

有杀身以成仁。以此数语，为其教戒而已矣。盖儒教对于生死问题，乃以局外国而严守中立者也。其切于人事之用，而不使人探索于空虚，自非他教所能及，故有谓儒教为非宗教者。

若夫佛教则不然，释迦本以此死生问题，弃其王子之位，三衣一钵，入山学道。彼时睹天地念无常，睹山川念无常，睹万物形体念无常。经十二年，而一旦于菩提树下，豁然大悟，其后广说妙法，普济众生，皆无不准此问题，以为济渡。以三界为火宅，以此身为毒蛇，特立十二因缘，以明生老病死，因果环复，苦业无穷。而以灭去无明，免此生死为唯一之手段。以为身者众苦之本，祸患之源，又以生死皆由于心，苦心灭则生死皆灭。龙树诸人绎之，亦谓所有一切法，皆是老死相，终不见一法，离生死有住，皆对于生死问题而力求其寂灭者也。此与儒教教义，实为大相反对。

而日本学之，则反能得二者之长，而相辅相助，以了人生之义务，故其人于成仁取义之大节，类能了达生死，捐躯致命以赴之。故楠正成之将赴难于溱川也，诣明极楚俊禅师而问以死生



释迦说法

释迦以此死生问题，弃其王子之位，三衣一钵，入山学道。经十二年，于菩提树下，豁然大悟。

交谢之际，禅师答曰：截断两头，当中一剑，而正成遂死。新田义贞之将死国也，以书遗子孙曰：进亦非死，退亦非生，死生终必有期，譬如由昼入夜，由夜入昼。其彻悟通达如此，故能轻弃其学佛之躯壳，以保全其学儒之精神。西乡、福泽之流，皆遵此道以成一世之伟人者也。吉田松阴有言：道尽心安，便是死所，乃诸人所共同之心得矣。

故山冈铁舟之论武士道曰：武士道之要素有四：一报父母之恩；二报众生之恩；三报国家之恩；四报三宝之恩。三宝者，佛、法、僧也。而行此武士道无他义焉，一言以蔽之，至诚无我而已。

由此观之，则日本之所谓武士道者，实儒实佛，非儒非佛，几于参合融化，两取其长，而别成一道矣。然其学儒之弊，不至文柔不振，而流于朝鲜；学佛之弊，不至虚寂无用，而流于印度。此必非拘守一家之说者，可以期此美果者也。而儒教之中，于孔孟以后，独宗阳明，更以知行合一之说，策其以身殉道之情，此又于儒术派别之宗尚，亦有以异于我国。择术既异，收效自殊，此皆其武士道成立之原素，而日本所以致霸于东洋者也。

由是反而观于我国，则战国以前，学术繁盛，未定一尊，人各鼓其聪明才智，以自献于社会，故其时实行之力，亦甚强毅，学道之士，心有所识，身必赴之，虽杀身冒死不顾焉，故中国之武士道，于彼时甚为发达。及乎刘汉之世，罢黜百家，独宗儒术，其后历代霸者，利其便己，皆因袭之，专以儒教为其国教。其间宋儒程朱之俦，稍变面目，虽不如阳明之



王阳明像

日本于孔孟之后，独宗阳明，策其以身殉道之情。

即知即行，勇敢能任，然于孔子之义，无大背焉。夫以儒教之专重现世主义，言生而不言死，切事近情，教人以求仁之术。使中国而果于数千年中，实行孔子之道，以至于今，则虽不能以杂霸武功，与今世列强争雄于地球之上，亦岂不能使彬彬礼义，为东方君子之国乎？

无如自汉以来，所谓尊崇儒教者，不过表面上欺人之词，而其实则所行者非儒教而杨朱之教也。世之学者皆谓杨朱祖述老聃，然老聃之道，广漠无涯，范围至大，儒家、道家、法家、兵家、阴谋，皆自此出，杨朱之学，不足与比肩也。庄子则固儒教之达人，略文而从质者，其论生死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又曰：死者，上无君，下无臣，亦无四时，从然而以天地为



老子像

老聃之道，广漠无涯。

春秋，虽南面王遂不能过，此齐物论之旨，其意有所寄也。若列子则主万物一体者，其言曰：死者，人生至乐之大者也，大哉乎死！君子息，小人伏，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不肖者伏。夫庄子以贵贱论，可以警富贵之偷生者，列子以君子小人论，以为同有一死，则君子何必为善，小人何必不为恶，此于劝世之道，无所当矣，然未如杨朱之甚也。杨朱之言曰：百年者寿命之大者也，虽然，达于百年者于千人无一人焉。又曰：人之生者奚为哉，奚乐哉，曰，鲜衣厚食之为尔，声音美色之为耳。又曰：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人，所以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又曰：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一矣。孰知其异，

且趣当生，奚遑死后。高桥五郎论之，谓是皆绝望之语，陷于自暴自弃，流于放情纵欲。

呜呼，推杨朱之罪，则亦何止于此。夫杨朱所持者，亦现世主义也。然于现世之中，不勉为人生应尽之道，而徒以鲜衣厚食声音美色为乐，至教人不为仁圣而为凶愚，不为尧舜而为桀纣。苟偷俄顷之欢娱，以待一死之臭腐，生前死后之是非毁誉，皆所不顾。此与孔子所持之现世主义，有大相反对，如水火不能相容者。此直人道之公敌，而不仅为孔教之仇讎也。然惟其与孔教所持，皆为现世主义，则凡孔教之徒，既不能以佛教之理了解死生问题，而惟于现世之中，日用寻常之事，兢兢业业，惟恐失坠，则必遇事遇物，皆为一身苦恼之缘。于是杨朱之说，得以乘间抵隙，入而据之。

学孔子则甚难，而学杨朱则甚易；学孔子则甚苦，而学杨朱则甚乐。人情莫不恶难而喜易，避苦而趋乐。于是我躬不阅，遑恤我后，遂为中国普通社会之思想。至今日而国事之危，有如累卵，举国上下，人尽知之。无论若何顽固之徒，未有实信今日之中国

为太平无事者。然知之而遂心焉忧之，谋所以挽救之者，举国中无几人焉。自公卿大夫士以至于庶人，日孜孜于社会，以谋其鲜衣厚食声音美色之乐，不求当世之誉，不顾后来之毁，甘为凶愚而不惜。至语以国事，则掩耳而走，瞠目而视，若与之言他国之事也者。问其意之所在，则偷生而已，畏死而已，姑保此首领寻娱乐以待死而已矣。不惟存之于心，抑且出之于口，与杨朱之说，无丝毫之差异，盖纯粹之杨朱现世主义也。



韩愈像

韩愈好为名实相反之论。

夫中国号称儒教之国，若以此而亡其国，抑岂孔子所能任咎者。然使中国果真屏孔子而师杨朱，取大成至圣之号，移而奉之一毛不拔之人，则群知中国为杨教之国，而非儒教之国，名实相符，表里如一，则亡国之原因，犹易寻其所在。无如儒教之徒，又曾有如韩愈等者，好为名实相反之论，以炫其奇。如其代周文作美里操曰：臣罪当诛，天王圣明。桀纣而可为圣明，则尧舜亦可为暴戾，凶愚之与仁圣，可以互易共名，此又杨朱之所不及料矣。然中国之人，方将欲阳奉孔子而阴师杨朱，则亦利用此谬说而乐为附和之。千百年来，此种论说，流行社会，又已成久假不归之势矣。

故中国今日之人，明知国家之危亡，犹可颂曰太平，明知官吏之腐败，犹可媚曰文明，明知人士之无罪，犹可诬曰当诛。充其量即谓杨朱大圣，孔子无道，盖亦无所不可。特古昔已定之位置，不敢骤易之耳。夫名实淆乱，表里违反至于如此。

则日本人之常言，孔子之道，不行于中国而行于日本，中国奉其名而日本行其实者，岂过言哉？不然，孔子所谓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何于中国无一能实行之人也？夫孔子之现世主义，行于日本，犹必假佛教以助之，而后实行之力始大。而况中国既无佛教之助，又有杨朱之夺，复有韩愈等，为我国民献自欺欺人之术，则秦汉以前轻死尚侠之武士道，果何自而有稍留根芽之地者乎？故中国武士道之所以销灭者，又因此似孔似杨非孔非杨之学说有以斩削之之故也。夫以儒教为正，以佛教为辅，而发达此武士道者，日本之所以强也；以儒教为表，以杨教为里，而斩除此武士道者，中国之所以弱也。此即所谓学术不同有以致之之故也。

夫武士道之所以可贵者，贵其能轻死尚侠，以谋国家社会之福利也。然而死者，实人生最难之问题。白隐禅师谓：死生者事实也，非可以空言空论自慰以慰人者。故苟非其人之理想，能超然

福壽公統并史中侍兼事章平同尉太校檢校節軍順得越吳



古代劍俠

武士道之所以可貴者，貴其能輕死尚
俠，以謀國家社會之福利也。

于死生之外，则必不能轻弃其身。而欲人知此身之轻而可弃，则此身以外，其更无重于此者乎？抑有重于此身而不与身同弃者乎？由此以求之，则宗教界、哲学界有一大问题焉，乃灵魂之死与不死是也。古今学者之所论，大抵出入于两端。

其主灵魂有死说者，有二派焉：其一则谓死者断灭而绝无，如法儒笛卡儿言人之死也，非灵魂去其身体之结果，不过身体之机械破坏而停止运动耳。然奈布尼克反对之，以为生物者多数之单子积合而成，其中一单子握主权而为灵魂，他单

子皆从属而为身体，植物之精神无死生，则人之单子亦无死生，故死者非消灭而进化也。其二则谓人死惟灵魂灭，其他不灭。如科学家朵因氏、哈克斯列氏、清达儿氏之倡生物进化论也，以为宇宙间之物体，皆由元素之化合，物体有生有灭，而元素无增无减，人身组织之物体，亦犹是也，虽生活力丧失以至于死，而势力恒存，物质不灭。然英儒西济伊克氏、买耶氏反对之，以为今日之哲学，不当反科学的而当超科学的，以目的论的见解，胜机械论的见解。科学者谓人类以适于地球热度而成形，然地球之原始如何乎？科学者谓地球由太阳分离，然太阳之原始又如何乎？以此穷科学者之说，凡此者皆谓灵魂有死说之未能尽善者也。

其主灵魂无死说者，亦有二派焉：其一则谓死后有转生。世界古时各种宗教，皆有此说。如犹太教之言天国地狱，印度之波罗门教、佛教之言八大地狱及修罗饿鬼畜生之各道轮回，埃及古

教之言人死之后，转辗于一百余种之动物而复为人，梭格拉底亦谓死者如船长促予出帆，生由死来，死由生来，于此有死，即于此有生，故以哲学为学死之学。然世人之反对此种论说者，则曰，告汝死尸，蠕蛆猬集者，汝之后身也，汝之转生也。呜呼，此实快论也，夫世界至今日，科学日进，此等谬说，自不待辨。欧美之人若此观念者，盖已渐少，惟南洋土蛮犹谓死为第二之生。中国今日下等社会、女子社会，犹恃此轮回报应之说，以为惩劝，则无教育之国所必有之现象也。其二则谓死后无转生，如普拉得之言人之精神居于肉身之中，而生束缚，故必于肉身上制下等之情欲，养本来之性质，而归复于实体。然加藤咄堂论之，谓精神舍此肉身，必无所归，则亦不能离肉身而存实体。

凡此者皆谓灵魂无死说之未尽善者也，然则灵魂果有死乎？果无死乎？欲言有死，则世之死者无所劝；欲言无死，则死后之精神，人谁见之者？虽然，吾思之吾重思之，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不独其体魄之异也，尤在其精神之异。禽兽之知觉，亦能觅食以避饥，择居以避寒，自谋其体魄之生活，惟其精神所及者，不过如此。虽亦有爱护其群之德，然不能发达此精神，使之布于当时而传于后世，此其所以不如人类也。若夫人类，专以体魄而论，据生物学者之言，则人猿同祖，其一身之构造，所以异于他动物者，盖亦几微无几，惟其精神可以位天地而育万物，此其所以为高等动物也。若如杨朱之学，专以其高尚纯洁之精神，用之于鲜衣厚食声音美色之地，以自适其体魄，图生前下等之乐，而不能任重致远，以谋人群之福利，则与禽兽直无以异，安见其为人类乎？

故人类与禽兽之界，不以体魄之构造分之。而以精神之作用分之，可一言以判焉，曰：精神战胜体魄者为人类，体魄战胜精神者为禽兽而已矣。虽然，人之精神与体魄战，而欲求其胜，此其事亦甚难。既有体魄，则有众苦，饥寒劳动，在在迫之，于是



夏桀像

桀纣以精神殉欲望，而成为凶愚。

衣食住三者之欲望以起。而此欲望者，因体魄而牵及精神，环吾一身种种困难皆为精神之累，此仁圣凶愚尧舜桀纣所同有而不能避者也。惟桀纣则以精神殉之而成为凶愚，尧舜则不以此变易其固有之精神而成为仁圣。

故仁人君子每遇不得已之际，辄毅然弃其体魄而保其精神。诚以理欲交战之际，必有一胜一败，二者既不可得兼，则宁舍体魄而取精神，以一死弃此臭皮囊之苦累焉。虽然，体魄则已死矣，其精神亦将与之俱死乎？是则不然，夫今日之世界，为古人之精神所创造，将来之

世界，又必为今人之精神所创造者，此人类进化之道，纯恃此以为之元素者也。仁者之精神，恒以普济众生为其毕生之义务，其身虽死，而其精神已宏被于当世与后来之社会。故孔子死矣，而世界儒教徒之精神，皆其精神也；释迦死矣，而世界佛教徒之精神，皆其精神也。于中国言孔子则孔子死，于日本言孔子则孔子生；于印度言释迦则释迦死，于日本言释迦则释迦生。死者其体魄，而生者其精神故耳。

由此推之，今世界之言共和者，无一而非华盛顿，言武功者无一而非拿破仑，言天赋人权者无一而非卢梭，言人群进化者无一而非达尔文。盖自世有孔子、释迦、华盛顿、拿破仑、卢梭、达尔文诸杰以来，由古及今，其精神所递禅所传播者，已不知有几万亿兆之孔子、释迦、华盛顿、拿破仑、卢梭、达尔文矣，而遂以成今日灿烂瑰奇之世界。其余圣贤豪杰之士，皆无不如此者，此无他，体魄者所以载人之精神者也，使无精神，则体魄无所用，使无体魄，则精神亦无所宿。